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上海财经大学发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优势和创新品质，组建八大融合创新团队，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上财智慧”。

开拓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研究新境界

■ 程恩富 伍山林 钟阳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战略部署，要求我们开拓“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新境界。这项工作大有可为、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为融合创新提供了巨大理论空间，“两个结合”为融合创新提供了根本方法论，融合创新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注重学术传承发展，做好批判性创新、系统性整合和体系化衔接工作。

第一，马克思主义丰富内涵为融合创新提供了巨大理论空间。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学科门类视角看，这一理论体系以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为支柱，为社会学、管理学、新闻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等提供了强大分析工具与思想资源。经过长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开放发展的知识体系。这为其与众多学科融合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开拓“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新境界提供了广阔空间。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能够贯通于众多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人民立场，核心追求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要求相关学科立足自身领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聚焦人的多维度多层次需求以及社会关系结构，作出有深度、有温度的理论回应。学科有边界，但理论研究必须面向复杂的客观现实。任何涉及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在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时都不能局限于书斋思辨，而必须立足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面向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在概念提炼、理论发展、命题检验乃至知识体系构建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品格。

马克思主义与诸多学科联系密切，融合创新潜力大。哲学社会科学自不必说，其他学科亦不乏其例，且在快速扩展。例如，在医学社会学领域，通过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关怀与社会分析，可以推动生命伦理的中国话语建构；在生态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等思想，为我们深刻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提供了重要视角。即便在看似距离较远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科学活动的社会属性、引导科技向善而行、评估技术社会效应等方面也有重要启示。

第二，坚持“两个结合”开辟融合创新新境界。

开拓“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新境界，旨在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守正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求我们从各相关学科对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之治等进行学理化提炼和体系化建构。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智慧的积淀日益丰厚。这既为开拓“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新境界创造了成熟条件，也提出了紧迫要求。当前，正是我们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从中国经验中凝练人文、制度、政策智慧并且形成体系化知识，进而启迪未来的关键时期。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和独特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理念上高度契合，二者结合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中华大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相辅相成，焕发出蓬勃生机，不仅是理论创新的生长点，而且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深刻改变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提升文明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不是简单拼接和染色，而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实现有机融合与创新发展。融合创新形态可因学科而异，但都必须立足社会实践、回答中国问题、服务人民需要。

第三，以融合创新助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与自然科学等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更具社会历史性，关乎国家和文化主体性。开拓“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新境界，主要面向哲学社会科学和相关交叉学科，必须牢固树立国家主体意识和文明自觉，立足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等，着力形成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理、彰显中国智慧，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学科、话语支撑。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积累了较厚基础，理论创新具备向更高层次跃升、更深程度推进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实践提供了大量独特鲜活的经验，为相关学科创新发展提供了充沛素材。勇立时代潮头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把握时机，加快推进实践经验的学术转化工作，实现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同时，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正吸引世界目光。许多寻找现代化新路的国家，期待从中国智慧中获得借鉴和启迪。以“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为抓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学术话语权，也将在分享中国经验和贡献中国智慧的过程中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把握关键环节推动融合创新向纵深发展。

“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是一项系统性理论工程，必须高度重视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学科分工是深化研究的必然路径，从具体学科切入推进“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是务实选择，有助于在特定学科领域做深做细。然而，我们进行深入专精研究时，必须胸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使“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成为一种深思熟虑、有机贯通的学术实践，力求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

二是注重学术传承与发展。在现有学科分类中，几乎每门哲学社会科学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思想渊源。这条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根脉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可以直接形成理论生长点。更重要的是，这种契合对中国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帮助我们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鲜活的中国道理。“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是从学术层面促进“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有机结合，实现“合脉”与创新。因此，必须注重学术传承发展，在“阐旧邦以辅新命”中深化融合创新，增强理论的历史厚度。一句话，要在“返本开新”中厚植“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的历史根基。

三是做好批判性创新工作。批判性创新是学术研究守正创新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对各个学科尤其是受西方影响较深的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性审视，识别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不适用性。另一方面，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照中国现实，在批判基础上实现创新，在创新基础上实现理论范式和体系的重建。特别是，根据中国的人文传统与制度特征等，从基础概念与逻辑起点入手进行底层创新，进而推动知识体系重构。

四是做好新成果体系化整合工作。新成果如果不融入知识体系，不参与知识体系的演化，增强知识体系的历史解释力、现实洞察力和未来引领力，其价值将得不到充分彰显。回望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创新、人文关怀、社会理想等方面的思想，经由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与研究者接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提供了宝贵资源。审视当下，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各个学科的理论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由此产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及时收集整理新成果，做好与既有理论的系统性整合和体系化衔接工作，清晰呈现学术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进而让研究者可以站在新的起点上确立探索的新方向。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融合创新研究

既有理论穿透力 又有实践解释力

■ 丁晓钦 郎旭华 江楠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国实践为根、以时代问题为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经济学各门类的深度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坚守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指引，又要深化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进而形成既有理论穿透力又有实践解释力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对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在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基础上指导和引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在立场上始终做坚持人民主体性的研究、在观点上始终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在方法上始终坚持系统观念，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前瞻性、战略性、可持续的思路指引。

一方面，推动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有机结合，在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框架研究个体经济行为。在方法论上遵循个体主义，肇始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所开创的理论传统，在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领域都得到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非排斥个体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但更为注重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分析，将社会视为按特殊规则或特定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相较于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分析方法更进一步地将个人考察经济问题的主观动机及行为选择，视为经济制度在个体行为的集中表现，从而实现了个人和社会整体的统一。

由此，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的共性规律与个性特征的有机结合，既要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把握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历史大势，避免在分析具体问题时陷入想当然的思维游戏中，也要从现实国情出发选择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道路的特异性，深入把握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机理，弄清楚制度变迁的历史趋势和宏观规律是如何在短期和微观层面进行呈现的，从而更好利用长期规律来指导经济建设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有机结合，从实践出发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目标间的合意性。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及其诱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表明人们仅仅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分析既有现实、只通过个体理性和自由市场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存在历史局限性的。这种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间的内在冲突，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同其客观发展规律间的不合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规律性，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阶段；另一方面，它指出这一规律可以被人们认识并加以利用，遵循预定的发展目标影响社会进程，从而减轻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矛盾和阵痛。这种辩证思维的智慧，既从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被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又坚持从实践的观点出发，为推动社会主义从构想落地为现实奠定思想基础。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瞩目成就，正是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和西方经济学教条、在实践中走出独立自主时代发展新路的典范。这一“富矿”为理论经济学实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有机结合，并在辩证逻辑指导下开展具体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形式逻辑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面向未来，我们要在指导思想上坚持辩证逻辑，在具体问题中灵活使用各类研究方法和工具，清晰揭示出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间、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间存在的相互作用，深入挖掘影响的作用机理、发展效应、适用范围等，充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性、真理性，进而形成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应用经济学的深化发展——

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分别涉及生产力布局、劳动者状况与国际价值分配，是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优势最为凸显的阵地，成为深化发展新时代应用经济学的突破口。

在生产力布局方面，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现代产业经济学加以改造融合。现代产业经济学以产品形态和服务性质为依据，将经济活动机械地分为三次产业，这种分类使统计分析更为方便，但忽视了不同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和价值创造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以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关系为基础，主张按照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来分析产业结构，揭示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和部类间的比例关系。对两大部类的分析不仅反映了商品之间的属性差异，更体现了生产的社会性质和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为分析产业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理论，为理解产业链的完整性与韧性提供了辩证视角。融合创新的方向在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空间经济学模型等理论视角以及投入产出分析等实证工具，量化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解释力和操作性，为优化国内产业空间布局、提振消费需求提供有力理论工具。

在劳动者状况方面，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对现代劳动经济学加以改造融合。西方主流劳动经济学理论将劳动者视为可投资、可增值的资本，忽视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混淆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掩盖了真实的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使用价值是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教育、培训等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并不能被简化为个人投资行为，而是与社会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紧密联系。融合创新的方向应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吸收现代劳动经济学在工资决定机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理论以及就业弹性分析等实证方面的丰富研究方法，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改革、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建立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劳动经济学，使经济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国际价值分配方面，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国际价值理论对现代国际贸易学加以改造融合。建立在自由市场与比较成本理论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国际贸易学理论虽然论证了国际分工的效率，但抽象掉了国际交换中的价值转移和剥夺关系，掩盖了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超额利润的事实。融合创新的方向应是深入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平等分工，运用现代贸易理论工具进行实证研究，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维护经济主权提供理论武器，构建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际贸易理论。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专家，研究员，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融合创新研究

现代化强劲引擎 高质量发展重器

■ 郝云 曹啸

金融，被誉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现代化进程的步伐。马克思主义与金融学的融合创新契合新时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等发展目标，也为马克思主义与金融学创新研究提供指导原则和方向。

重要成果——

一是聚焦“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根本原则的学理阐释方面，紧紧围绕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这一根本宗旨展开。深入探讨如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化为金融政策的评价标准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准则，确保金融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服务于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在做好“五篇大文章”方面系统谋划，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进行精细化、体系化研究。

二是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理论范式转变。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与核心旨在突破西方主流金融学“价值中立”和“技术至上”的局限，建立一套体现中国立场、价值与方法的理论范式。在方法论上坚持“两个结合”：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高度重视系统总结新中国金融发展史，提炼其中蕴含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系统挖掘中国历史上“票号”“钱庄”等金融雏形中的治理智慧，并弘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诚信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以及“量入为出”的节俭精神，旨在为现代金融市场契约精神、风险文化和商业伦理注入深厚的文化基因。

三是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式，深刻剖析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矛盾。此维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批判视野，旨在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提供镜鉴，包括对金融化与“金融幻象”的揭示，分析当代金融资本如何通过证券化、衍生品和算法交易，构建出一个高度复杂且脱离实体价值的虚拟经济体，以及对数字金融垄断与美元霸权的批判，研究分析金融资本与大型科技公司结合所形成的“数字平台垄断金融”新形态，揭示其通过掌控数据要素和支付渠道可能带来的新型剥削与风险等。

四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研究，构筑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精神内核。聚焦金融活动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深层的文化支撑与软实力保障，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治理的融合创新、深入阐释“义利观”“诚信观”等传统智慧的时代价值、对“五要五不”行为准则的体系化构建。

五是加强对红色金融的研究，夯实金融强国建设的理论根基与实践源流。系统梳理与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金融实践，旨在从历史脉络中提炼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化的初心与智慧，为新时代金融工作提供深刻的历史基础与精神滋养，包括对当时金融实践的学理阐释，揭示红色金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金融实践相结合的早期光辉典范，以及对“钱袋子”支持“枪杆子”的实践路径提炼。

六是深化马克思金融与银行理论研究，夯实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理论根基。系统挖掘与阐释马克思关于信用、银行与虚拟资本的核心理论，旨在从经典理论的源头厘清金融运行的根本规律与二重性，为有效应对当代金融风险、构建中国自主的金融知识体系提供根本遵循。

核心观点——

一是“社会主义金融本质论”，清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金融”的基本原理出发，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功能，从根本上与西方金融化模式划清界限。

二是“金融利润分享机制论”，认为金融业让利并非单向度的价值转移，而是通过“利润分享”机制，激励实体企业扩大再生产，进而通过“资本周转加速”与“利润率平均化”反哺金融部门，形成正反馈循环。

三是“金融强国论的范式创新论”，形成了“金融强国=强大经济基础+核心金融要素+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指导”的公式化表达，力图将国家战略构想拆解为可分析、可操作的理论模块。这一公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首次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指导”作为构成性要素，与硬性的经济、金融条件并列，暗示金融强国的中国性不仅在于体量规模，更在于理论范式的主体性。

发展方向——

虽然“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融合创新研究在成果数量、议题广度上呈现繁荣现象，但理论生产链依然存在断裂现象，具体表现为范式转换未能完成的症候性显现、交叉创新薄弱、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翻译腔”与“自我东方化”等现象存在。

一要系统发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理论。马克思的信用制度及金融思想是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洞察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关键部分，系统发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的金融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要科学把握金融学的运行原理。深度把握金融学的运行原理，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时代意义。它不仅是理解全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形成和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逻辑前提，更是主动驾驭金融力量、避免其“脱实向虚”的必要条件。不仅要掌握精巧的数理模型，更要透视背后的市场逻辑、行为假设与制度约束，从而把金融从一种自发盲目的力量转变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性、可控的战略重器。

三要构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基础之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经济的特点与制度优势。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金融体系的运行必须服务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少数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既要充分借鉴和运用现代金融学的先进原理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又必须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意味着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探索出一条既能有效驾驭和利用资本，又能确保其发展方向始终符合国家战略与人民福祉的独特道路，使金融真正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引擎，而非滋生系统性风险的温床。

四要加强“理论—政策”对接机制与实践检验的应用。建立理论创新与政策制定的对接机制、强化实践检验，在2025年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保障。2025年，部分高校设立金融理论政策转化办公室，建立“学者挂职—政策实时咨询—试点成效反馈”的闭环，旨在将批判性理论快速转化为建设性政策。

归根结底，金融学科正处于技术进步和市场化进程加速的深刻影响之中。金融不仅为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还需要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大助力。要立足中国实际，深入挖掘中国金融发展的独特规律和内在逻辑，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融合创新。

（作者均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